

九十年代澳門大眾政治文化縱向研究

余振

（編者按：本文為余振博士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在浸會大學所主辦「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週年：機會與挑戰」研討會上所發表的論文，中文版收錄在余博士所編《澳門回歸前後的問題與對策》一書中，現承作者慨允轉載，特此致謝。）

一九九一年四月至十月，筆者與澳門大學兩位同事進行一項問卷調查，根據統計暨普查司的全澳住戶資料，經過隨機抽樣，我們的調查員（澳大社會科學院學生）在全澳各區入戶訪問，成功訪問

了六百六十三位年齡在十八歲以上及在澳門居住最少一年的成年人，成功率達百分之六十五。我們將是次的調查結果寫成專著《澳門華人政治文化》，於一九九三年由澳門基金會出版。事隔八年，澳門很快就擺脫葡萄牙殖民政府的管治，回歸祖國，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八年來澳門人的政治文化有甚麼顯著的改變？澳門人是否仍然像八年前一樣，是一種「臣屬型」和「參與型」混合的文化？（一）澳門市民是否有條件及心理質素實行「澳人治澳」？澳門的大眾政治文化

是否有利於澳門的民主發展？

爲了解答以上及有關的問題，筆者於一九九九年一月進行一項電話問卷調查，用隨機抽樣的方法，我們的調查員成功訪問了四百九十六名澳門成年居民，成功率達百分之六十。上述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九年的調查樣本都頗有代表性：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的分配比例都與實際澳門人口的比例相近。六十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在一九九九年的調查樣本略爲偏低，主要是因爲老年人的聽覺衰退，聽不清楚電話訪問員提出的問題，所以很多老年人都沒法完成長達二十分鐘的電話訪問。我們的調查樣本包括各行各業及不同社會階層、工資收入的人士。總的來說，我們的調查樣本很有代表性，調查結果的可信性很高。

澳門市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

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九年的調查結果都顯示澳門市民一般都很關心公共事務：分別有百分之六

十六點七（1991）和七十一點四（1999）被訪者「每天」或「經常」閱讀報紙、收看电视台或收聽電台的新聞報導。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九九年的被訪者，相對一九九一年的被訪者，傾向與別人討論政府事務：約四成的一九九九年被訪者「經常」或「間中」與家人或朋友討論政府事務，但不足三成的一九九一年被訪者會這樣做。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澳門的回歸引發更多人關心公共事務和澳門政府的施政和政策。但應該指出的是，澳門人還是比較沉默的，在一九九九年初的調查，還有六成市民「從不」或「很少」與別人討論政府事務。這反映出中國文化中不涉足及少談政治的傳統仍然根深蒂固的影響著大部分澳門市民。

澳門人的民主觀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公民對民主政治概念的理解，對當地的民主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根據一九九一年的調查結果，九十年代的澳門人傾向將一個

民主的政府等同於一個「好政府」。在有關民主理念的元素中，在一九九一年的調查，最多被訪者（百分之三十）認為一個民主政府應「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其次是給予人民有言論自由的政府（百分之二十一點二）；只有百分之九點六的被訪者認為一個民主政府應由人民選出來（見表一）。這個被普遍認為是西方民主政制不可或缺的要素——民選政府，似乎在九十年代初還未在澳門人中獲得應有的重視。同時間，另一個西方民主政治要素——按三權（行政、立法、司法權）分立原則組成的政府，竟然是最少人（百分之二）選擇的答案。換言之，澳門人傾向強調民主的最終目的——成爲一個「好政府」，而忽略了產生民主的手段或過程。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有接近四成的被訪者不知民主爲何物，回答不出一項民主政治的要素。

在一九九一年的調查，這一條問題是採取封閉式的，我們列出七項民主要素，被訪者可以選擇多項作答。一九九九年，我們改用開放式的問題，

被訪者可自由提出他們對民主政治的看法。今年的調查顯示，澳門市民對民主政治理念的理解，與八年前相比，有明顯的變化。表一顯示，最多人認同的民主政治要素是政府必須是由人民選出來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三），其次才是一個「聽取民意、照

表一 澳門人的民主觀（百分比）

怎樣才算是一個民主政府？ （可選多項）	1991 (樣本數 = 663)	1999 (樣本數 = 496)
1. 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	30.0	26.0
2. 人民有言論自由	21.2	22.9
3. 政府由人民選出來	9.6	32.3
4. 廉潔公正的政府	8.1	10.9
5. 按法律辦事的政府	4.8	3.4
6. 行政效率高的政府	4.8	0.9
7. 按三權分立原則組成的政府	3.0	1.7
8. 決策透明度高的政府	---	10.0
9.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	2.9
10. 一個尊重人權的政府	---	2.0
11. 其他	13.3	18.0
12. 不知道/無意見	39.6	34.5

顧市民利益」的政府（百分之二十六）和一個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政府（百分之二十二點九）。澳門人對民選政府的重視是令人驚喜的，並且對澳門的未來民主政治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可能的解釋是，經歷過九十年代三次立法會（1991, 1992 和 1996 年）和市政議會的選舉，澳門人認識到選舉的重要性，形成了一種新的選舉文化。

不過，應指出在回歸前夕，澳門人對民主政治的了解仍然不夠全面和欠缺深度。跟九十年代初的調查結果一樣，很少澳門人認識到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互相制衡對民主政制運作的重要性。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澳門人（尤其是新移民）長期受到國內領導人或輿論對西方三權分立政制的批評的影響，認為三權分立不適宜中國或港澳特別行政區，所以忽略了這個在西方民主政制中不可或缺制衡機制。尤其中央政府長期宣傳只有以「行政主導」的政府才適合港澳特區情，並通過基本法，在兩地實行「行政主導」的政制，澳門人是很難認

識到權力制衡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長遠來說，很不利於澳門的民主政治發展。雖然，不少澳門人認識到言論自由及社會輿論對政府的監督作用，但衆所周知，澳門傳媒的政治取向一邊倒，只會「唱好」由中央政府委任的特區政府，很少不同的聲音。

對政治參與的態度取向

我們發覺九十年代初和今年初的調查結果，最大分別在於澳門市民對澳葡殖民地政府態度的改變。在一九九一年的調查，百分之五十五點八的被訪者同意或很同意「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我們好，所以我們應服從政府」；但一九九一年的調查只有百分之十四的被訪者同意或很同意上面的說法（見表二）。調查結果顯示：（一）澳門人對表現乏善足陳的澳葡夕陽政府投以不信任的一票；（二）澳門市民已經不再是傳統的只知服從政治權威的「順民」。事實上，根據一九九八年底的另一項電話訪

問調查，澳門市民對治安惡劣及長期經濟衰退表示強烈不滿，對夕陽政府的表現感到很失望。^(二)澳門的沉默大多數已經不再沉默，他們在私底下及公眾場合都批評政府的無能和錯誤政策。

部分可能由於對殖民地政府表現失望，澳門人一般對政治人物或官員評價不高。表二顯示，在今年初調查，只有百分之三十一的被訪者同意或很同意「從事政治是高尚的工作」，比一九九一年的調查下跌了十四個百分點。跟八年前一樣，很多澳門人對參與政治活動仍抱有戒心，約四成的被訪者認為「搞政治好危險」。然而，百分之六十一點四被訪者覺得每一個澳門市民，不論貧富或社會地位，應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百分之七十九點五認為一個好市民有義務在選舉中投票。

另外一個改變不大的態度取向是澳門人相互之間的信任感。雖然澳門經濟持續不景氣及社會治安情況未見改善，澳門市民相互之間的信任及容忍程度未見減退。一九九九年初的調查顯示，百分之

表二 對政治參與的態度取向（百分比）

您同意下列的說法嗎？	很同意	同意	無意見/中立	不同意	很不同意
市民不適宜參加政治活動					
1991年調查	0.8	23.9	18.9	54.7	1.8
1999年調查	0.2	20.0	18.4	57.4	4.0
好市民有義務在選舉中投票					
1991年調查	5.7	79.8	11.3	3.3	0.2
1999年調查	9.5	70.0	12.3	8.1	0.2
從事政治是高尚的工作					
1991年調查	0.8	44.2	25.3	28.4	1.4
1999年調查	1.0	30.0	30.6	37.2	1.2
搞政治好危險					
1991年調查	3.6	40.2	24.5	30.9	0.8
1999年調查	2.2	37.4	30.7	29.7	0.0
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我們好，所以我們應該服務政府					
1991年調查	2.6	53.2	16.8	26.6	0.9
1999年調查	0.4	13.6	12.8	65.8	7.5

五十一點一的被訪者同意和百分之二點八很同意「多數澳門人都是誠實可靠和可以信任的」，雖然同時間百分之三十六點七的被訪者覺得「在澳門社會上做事很容易被人利用」。

澳門人對人和對事都頗能容忍；百分之四十七點五同意和百分之二點八很同意「凡事不要與人爭，能忍則忍」。但澳門人並不是無原則的容忍下去，百分之七十點八的被訪者同意和百分之八點九很同意「對於自己認為正確的，應該據理力爭」這個說法。簡言之，跟八年前一樣，回歸前夕的澳門文化是一個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有中國傳統的忍讓、和諧和誠信的美德，和擁有現代西方的開放、公平競爭觀念。^(三)

澳門人的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是「參與型」政治文化的重要指標。只有當市民有信心他們可以影響政府政策，他們才會積極議政論政。政治效能有兩個面向：公民能力

(civic competence)，和臣民能力 (subject competence)；前者指公民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後者指公民對向政府部門或官員求助的信心。一九九一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人的公民和臣民能力都偏低。在過去八年來，澳門人的政治效能感有沒有明顯增強呢？表三和表四顯示，澳門人的政治效能感改變不大。好像九十年代初一樣，只有極少（百分之一點八）被訪者覺得他們有或肯定有能力去影響政府的決策，而百分之八十五點七覺得他們只有很少或完全没有能力去影響政府決策。同時，只有百分之十二點二的被訪者相信當他們有事情找政府部門幫忙，有關部門會認真幫他們解決問題。百分之四十一點二對有關政府部門缺乏信心，比一九九一年調查還要高出十個百分點。很明顯，澳門人對澳葡夕陽政府失去信心。澳門人對未來特區政府會不會恢復政治效能感呢？這就要看特區政府的表現了。

表三 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百分比）

您覺得您有能力去影響澳門政府的決策嗎？	肯定有	有	間中有	很少	完全没有	不知道／無意見	樣本數
1991年調查	0.5	3.2	2.0	18.2	76.1	—	658
1999年調查	0.2	1.6	3.2	17.8	67.9	9.3	496

表四 對向政府部門求助的信心（百分比）

如果您有事找澳門政府部門幫忙，您覺得有關部門會認真幫您解決問題嗎？	肯定會	多數會	或者會	多數不會	肯定不會	不知道／無意見	樣本數
1991年調查	1.5	12.5	32.5	19.7	11.0	22.8	661
1999年調查	0.5	11.7	30.7	31.9	9.3	15.8	496

澳門人對澳葡政府的失望反映在實際行動上。當被問及如果政府的政策嚴重損害他們的利益，他們會否採取行動去提出反對，只有百分之二十二點七的被訪者表示他們肯定會或多數會採取行動，比一九九一年的調查少了十三個百分點（見表五）。換言之，很多澳門人對澳葡政府完全失去信心，不相信有關當局會回應他們的行動或要求。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會採取實際行動去批評和反對政府政策的人比九十年代初少了，但這部分人會更積極的採取多種不同渠道去反映他們對政府的不滿。表六顯示，與一九九一年的調查比較，在比例上有多過三倍的被訪者會向有關政府部門投訴、找議員或社會團體幫忙、寫信或致電報紙、電台、電視台等傳媒反映意見的比例亦增加了一倍。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百分之十一點二的澳門市民會選擇比較偏激的請願、遊行、示威、靜坐等行動。相對香港人來說，澳門人比較保守、自制和溫和多了。

背景因素

我們一九九一和一九九九年的調查結果都顯示，澳門大多數的女性，跟男性一樣，對政府施政表現持批判的態度；她們對政治參與採取肯定和積極的態度，認為一個人「對於自己認為正確的，應該據理力爭」。我們的調查結果清楚顯示，澳門的女性已經不是傳統中國社會的被動和任人支配的角色。她們希望在公共事務決策過程中，有婦女的聲音，在未來澳門的政制發展中，有婦女的參與。

在一九九一年的調查，我們發現年青人，相比他們的父輩或祖父輩，傾向批評政府政策、積極參與政治、爭取和維護個人利益、不大相信其他人和不願意對別人過度忍讓。在一九九九年的調查，我們發現在對傳統的忍讓美德的態度上，年青人和他們的長輩仍存在明顯的代溝。百分之七十一點四的五十歲或以上年齡的被訪者同意或很同意「凡事

表五 對政府錯誤政策的態度（百分比）

如果政府的政策嚴重損害您的利益，您會採取行動去提出反對嗎？	肯定會	多數會	或者會	多數不會	肯定不會	無意見	樣本數
1991年調查	18.1	17.3	19.8	21.1	12.6	11.1	658
1999年調查	9.3	13.4	17.8	35.0	9.5	15.0	496

表六 對政府錯誤政策可能採取的行動（百分比）

	1991	1999
1.找政府部門投訴	19.0	59.7
2.找議員幫忙	11.3	41.3
3.寫信、致電去報紙、電台等傳媒	20.1	38.8
4.找社會團體幫忙	9.1	28.1
5.請願、遊行、示威、靜坐	13.2	11.2
6.其他行動	25.6	6.5
7.不知道/無意見	24.2	18.9

不要與人爭，能忍則忍」的說法，但只有百分之三十八點三的十八歲至二十九歲組別被訪者贊同上面的說法。但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我們沒有發現顯著的分歧。換言之，各年齡組別的人，對政治的態度取向在九十年代逐漸形成共識。可能的解釋是，「九九」回歸效應和澳葡政府的令人失望的施政表現促成澳門市民對有關政治問題形成共識。

一九九一的調查結果支持教育和政治發展有正相關關係的看法。教育程度高的較傾向關心公共事務、對政府政策持批判態度和積極參與政治。他們對傳統上的政治疏離態度和順民心態很不以為然。一九九年初的調查肯定和支持一九九一年的調查結果。譬如，百分之八十三的大專畢業生被訪者「每天」或「經常」留意報紙、電台或電視台的新聞報導，但只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小學或低於小學教育程度的被訪者這樣做；而且，前者較後者（五點二的比例）傾向與朋友或家人討論公共事務。更值得注意的是，百分之八十二受過高等教育的被訪

者不同意或很不同意「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我們好，所以我們應該服從政府」這個說法，比只有小學及沒有受過教育的被訪者高出三十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對西方民主政治有較深和較全面的認識，並且有較高的政治效能感。根據統計暨普查司的數據，九十年代澳門人的教育程度明顯提高。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澳門的政治文化，正穩步從一個相對封閉、被動的「臣屬型」文化過渡到一開放、主動的「參與型」文化。

另外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是在澳門的居留時間。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澳門的居留時間與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成正相關。一九九年的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五的土生土長的被訪者每日或經常留意傳媒的新聞報導，比在澳門居留少於十年的新移民高出二十四個百分點；而且前者比後者（二點一的比例）傾向與朋友或家人討論公共政府事務。根據一九九一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九十年代初只有百分之四十點一澳門常住人口在澳門出生，而

一九九六年的中期人口抽樣調查，估計在澳門出生的人口佔百分之四十四點一，一九九九年或二零零零年初，估計澳門有一半人口是在本地出生。可以預見，「九九」後的澳門特區政府將會面對更多關心公共事務和積極參與議政的新一代澳門人。

澳門政治文化的延續與變化

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 (Gabriel A. Almond)

和弗白 (Sidney Verba) 認為一個人對於一個政治系統的態度取向，可分為認知、情感和評價三個層面。^(四) 我們的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九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市民的認知取向與教育程度成正相關。教育程度較高的市民對政治體制及政府事務的認知程度一般亦較高。當澳門市民整體教育水平在過去八年顯著提高，我們期望澳門人對政治體制和政府事務的認知程度會相應提高。我們一九九九年的電話訪問調查結果支持我們這個看法。

公民對政治體制及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取向

亦與教育程度成正相關。教育程度較高的市民傾向對政府政策持批判的態度。所以一九九九年年初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人比八年前更傾向批評政府，我們一點不感到驚訝。不過，應該指出，教育程度並不是唯一的影響市民的評價取向的因素。澳葡夕陽政府令人失望的施政表現，尤其是政府無法扭轉長期經濟不景氣和治安惡劣的局面，是近年澳門市民對政府批評不斷升級的主要原因。

公民對政治體制的情感取向比較複雜。政府的施政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公民對政治體制的情感取向。在一九九九年初的調查結果顯示，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被訪者以身為澳門人感到自豪，比八年前的調查跌了十八個百分點。九十年代初，國內因為「六四事件」受到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經濟發展受到挫折，在政治方面亦加強對言論出版的控制。很多澳門人對澳門的強勁、雙位數字的經濟發展引以為傲；不少澳門人對澳門擁有的言論自由和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制度感到慶幸。而在一九九九

年初的調查，很多被訪者表示他們覺得澳門沒有甚麼地方值得引以為豪的。不過，仍有不少澳門人對澳門有歸屬感，尤其是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幾十年的老居民，和「生於斯、長於斯」的年青一代。

近八年來澳門政治文化最大的變化是一個新的選舉文化的出現。九十年代澳門市民經歷過三次立法會和兩次市政廳議會的選舉，很多市民開始認識到選舉的意義及一個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的重要性。在今年初的調查，「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取代了「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的政府」，成為最多被訪者選擇的民主要素。換言之，澳門人已經逐漸脫離傳統中國老百姓渴望追求一個「萬能政府」的價值觀，並開始注重民主的手段和過程。這種態度取向的改變可以說是一種質的飛躍，假以時日，可能與西方的民主價值觀接軌。

但一些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價值觀仍然繼續影響著澳門人對政治的態度取向。澳門市民一般對政治工作或政治人物評價不高，一般不願意涉足

政治，認為搞政治有風險。另一方面，好像他們的先輩一樣，澳門市民一般不相信他們有能力去影響政府的政策，或有關政府部門會認真的幫助他們解決困難或問題。因此很少澳門人會採取行動去反對政府的錯誤政策。再者，傳統文化對政治權威的順從和對人的極度忍讓仍然深植於一部分澳門人的心中，繼續影響著他們的政治取向和行爲。

結語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文化的改變，主要取決於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 (一) 大眾文化素質的整體提高。文化素質的提高包括教育程度、專業知識的提高，法制觀念、民主觀念的普及和提升等。
- (二) 以專業人士爲主的中產階級的形成和壯大。
- (三) 政治氛圍的改變。從筆者和其他學者、研究人員的調查可知，一個地方政治文化的改變受當地的政治氛圍的影響很大。當一個政府

慣於黑箱作業，言路封閉，大眾的政治效能感就低，就不願參政議政，對社會事務就不積極、不投入。相反，有一個開放、願意聽取民意的政府，大眾參政的意欲就會增強。

(四) 公民意識的積累。政治文化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人們從小不斷接受良好的公民教育，樹立正確的民主政治意識，從而因應環境的不斷變遷，通過不斷的參與，促使政治文化的逐步發展。

(五) 傳媒功能的全面發揮。大眾常常透過傳媒的報導、分析，對社會的情況和政府的政策形成某種認識。如果傳媒不能準確全面地反映現實，而是作些偏頗的輿論引導，就容易誤導大眾，起不到真正的監督政府作用。

(六) 外部政治氣候的改變。我們已經走進資訊開放的時代，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各種政治變革和發展都能很快得到傳播，這必然影響到人們對民主政治的了解和追求。

以上第一、二和六點基本上是客觀形勢的改變，已經並將會更進一步影響澳門政治文化的變化。第五點最弱，還好，差不多有一半澳門人除閱讀本地報紙外，還閱讀香港的報紙，而且絕大部分收看香港電視台的新聞報導。^(五)這對平衡本地傳媒以政治取向為主導的新聞報導起一定的作用。

第三和第四點的改善，取決於未來特區政府的政策取向。特區政府應該審核和統一制訂本澳中、小學校的公民教育課程，對兒童從小灌輸正確的民主政治意識和愛國愛澳意識，加強他們對祖國和澳門的歸屬感，並逐步加強他們對民主政治的認識。事實上，今年初的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九十四的被訪者表示他們心中理想的政治是民主政治，而百分之七十五認為民主政治適合澳門，這是令人鼓舞的。

為了一洗澳葡殖民地政府的封閉、黑箱作業的形象，未來特區政府應廣開言路，增加政府決策的透明度，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搜集民意，務

求政府所有政策都以民意為依歸。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澳門大眾的參政議政意欲自然就會增強，特區政府在澳門市民中的認受性就會提高，官民關係就會顯著改善，社會就會日趨和諧及穩定。 □

註釋：

- (一) 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和弗巴在《公民文化》一書，根據公民對政治體系、具體的輸入和輸出功能以及個人擔任的政治角色的認知、情感和評價的狀況將政治文化分為三種類型：一·地域型文化、二·臣屬型文化、三·參與型文化。但是兩人強調，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只是某一種純粹形態的政治文化，而必然是兩類或三類文化的綜合體。當然，必有一類居主導地位，構成主流政治文化。
- (二) 筆者於1998年12月進行一項電話訪問，採用隨機抽樣的方法，成功的訪問了588位澳門
- (三) 成年市民。
- (四) 「對於自己認為正確的，應該據理力爭」這個態度取向實質上含有中西文化的傳統。中國古聖賢、英雄一向強調一個人應該有原則，有氣節，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並應擇善固執。同時間，西方的價值觀特別強調每一個人都應該擁有同等機會，在公開、公平的競爭規則下，爭取和維護個人的利益。在一個法治的社會，以上的平等、公平原則是得到法律的保障的。相比，中國古聖賢、豪傑的道德規範，並不是每一個市民百姓都可以或有條件模仿的。
- (五)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p.15.
- 余振著，「澳門市民對『九九』回歸的看法」，《澳門回歸前後的問題與對策》，名流政策(澳門)研究所，1999年6月。